



中国当代图书评论家书系

出版与近代文明

王建辉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出版

出版与近代文明

王德平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当代图书评论家书系

出版与近代文明

王建辉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版与近代文明/王建辉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4

ISBN 7-81091-450-2

I. 出… II. 王… III. 出版工作—理论研究—文集 IV. G23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5274 号

责任编辑 杨风华 纪庆芳

封面设计 曾 晶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400 千字

ISBN 7-81091-450-2/G·772

定 价: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责任编辑 杨风华 纪庆芳
封面设计 曾 晶

对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代自序)

中国近代史是从19世纪40年代发端的,下迄20世纪40年代末。近代出版史也大致与此对应,也就是说出版史和政治史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重叠,其起始以林则徐、魏源等翻译西书为标志。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出版,其实是从近代之河发源的。由近代机器文明开创的近代新式出版,延向后世,成为当代出版的一个源流,研究近代出版史是做好当代出版的一个起点,并且在我看来,出版史其实是未来出版的一种预设。

新中国的近代出版史研究庶几可以说是从张静庐起步的,50年代编辑出版的这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集共8册,张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出版的见证人之一,这样一种经历使这部史料集历50年而不倒,到了世纪之交才有宋应离的当代出版史料8册,以及宋原放等主编的通史式的出版史料10册(其中近代100年为6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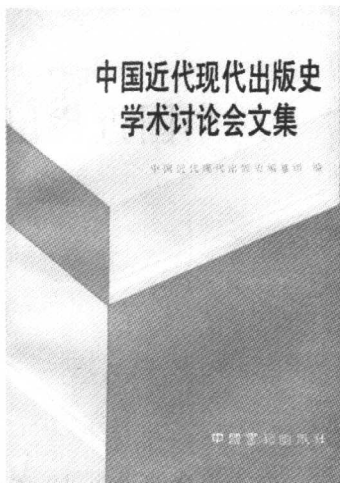
两个十年代之比较

和中国政治形势在1979年出现春天一样,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是从1979年开始复苏的。20年间近代出版史研究的兴起,建立在这样两个基点上,一是中国新时期出版事业的空前发展,二是为了开创现在与未来需要求得前史之鉴。而研究近代出版史的目的之一,也

就是要提炼出版遗产的精华。这里试看两个十年代。

在 80 年代,中国出版史的起步是可观的。它有这样一些标志性事件:首先,由于国家出版管理机关的重视,中国各省出版志开始纂修,这是近代出版研究的一个新的开始。如此大范围地修出版志,在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头一回。这样一个过程延续了好几年上十年,后延 90 年代,其中以江苏省对本省近代出版业的研究最为注目,并根据历史建制将上海也纳入江苏的范围,出版了专著十余种(江苏人民出版社)。其次,以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开始对于近代革命出版传统的研究,全国 26 个省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完成了征集工作和一部分编写任务,出版了若干著作。再次,中国出版科研所在 80 年代中期成立,虽然它本身并没有进行近代出版史的研究,但它着手组织了在湖南的大庸(张家界)、山西的太原、陕西的延安召开的几次近代出版史的学术研讨会,对新时期早期的近现代出版史有很大的学术推动,推出了三本集体的论文集:《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共收入 178 篇论文,可以说是近代出版史研究起步期的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它的研究指向是很明确的,就是探讨近代出版的优良传统,为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提供历史的经验。像后面这一个课题,还是由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宋木文先生提出来的。又次,以商务印书馆 90 周年纪念为契机,有关方面与人士对于商务和张元济的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把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引向个案的深入,开始了专业研究的历程。

这个十年的近代出版史科研的一个特点是跨年代的。80 年代开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封面

始的这一波近代出版史研究,延至1993年中以《出版史料》的终刊(共出32期)为标志而告一段落。综观这一阶段的近代出版史研究,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它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这种成绩的取得又体现出从上至下的有组织性。

90年代,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出版史研究的低谷年代。我不太赞成这样的说法。因为它只说对了问题的一部分,因为90年代开始以后,尤其是后半期,中国近代出版的研究有了新的起色和某种深入。

1. 载体的新生。一花谢而百花开,中国的各种媒体尤其是出版类媒体,对于出版史开始重视,很少有不设立出版史专栏的。叶再生编辑的《出版史研究》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8年坚持了6期,难能可贵的是这几期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由叶先生自费经营的。这样一种看起来是学者的个人行为,表现出的则是一种学术的转型。
2. 出版界重新重视近代出版史的研究,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重视出版史尤其是近代出版史,他们要从近代出版史发掘出新的内涵。中国编辑学会1993年在武汉开过一次编辑出版史学术研讨会,时隔6年之后1999年在南京召开了第二届编辑出版史研讨会,2000年在温州召开了第三次编辑出版史研讨会。中国出版科研所1996年在济南召开了《中国出版通史》的编纂会议,尽管这个过程可能还要两个五年计划才能实现,但毕竟启动了“通史”的车轮。出版史的博士论文终于问世。孙晶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得以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有两种近代出版史的博士论文,其中一种是王建辉的《文化的商务》(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 科研成果的体现形式,80年代主要是集体的论文集,90年代则主要是个人专著和各种资料集。商务成立100周年纪念以及中国印刷博物馆的成立,把90年代的近代出版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以上所述透露出一种信息,这就是和80年代相较,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表现出一种研究的自觉和学术的自信。

三种类型研究者之分析

近代出版史的研究者,大致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出版从业人员,姑且称为行业派,一个是大学院墙里的研究者,姑且称之为学院派。

行业派中人。如宋原放、叶再生、吉少甫、汪家熔等,他们注重出版史事的考订与叙述。他们的长处,是对于出版有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验,分析问题较为准确,且以史料见长,而短处(如果有的话)则是对于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了解不够,缺乏大视野。宋原放对于重视出版史研究的呼吁以及对于近代出版史料的整理,叶再生对于中共党史以及中共出版史史料的搜集,都有开创之功。吉少甫的《书林初探》(上海三联书店),汪家熔的《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都是论文集,是这一派学者的主要成果,后者是目前篇幅最大的近代出版史专著。

学院派中人。这些学人往往以出版史作为其他学术的辅助。这里有两部分,一部分学者是从书史及图书情报学切入或衍生的,像肖东发、王余光、张志强、徐雁平等,他们的研究和出版联接得较为紧密,相对专业化,他们没有直接从事出版的经历,因此对于出版内在规律的发现与论述可能有相当的不足。王余光在武汉大学带研究生,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多集中在近代出版史,假以时日可能会形成系列,但后调北京大学这种系列化可能中断。另一部分学者则是从思想文化史切入,像陈思和、陈平原、杨扬、邹振环等,他们对于出版史的研究是和近代知识分子研究以及近现代文学和翻译的研究相结合的,或和其他的学术研究相结合,揭示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出版和近现代文学及翻译的关系,是这一部分学者的用功所在。学院派以分析推论见长。就主要成果言,前一部分人主要发表在编辑出版类杂志上,代表作有王余光等的《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均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一部分人则主要发表在校学报及其他学术杂志上,代表作有陈思和的《现代出版与知

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刊《复旦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陈平原对《点石斋画报》的研究(主要见于《中华读书报》),钱理群主持的《文学与出版丛书》(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学院派对出版史研究的投入,给近代出版史的研究带来新的解读,也表明出版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推动开始为人们所注目。

或许还有第三种类型,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学院派,也不是纯粹的行业派,而是介于两种之间。老一辈的如陈原、李侃,少一辈的如王建辉。他们试图在两者间打通。因为他们既有从事出版的丰富经历,也有从事其他学科纯学术研究的多年追求,在出版史、思想史、文化史中融合,陈、李的研究主要是张元济与商务,李侃是客串,成果无多(《论张元济》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陈原对张元济与商务的研究可能影响一代学人(《陈原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王建辉则在90年代中期以来,将主要的学术兴趣放在近代出版史方面,他的《“五四”与新出版》及博士论文可以算作代表。

这是研究的不同的路径和指向。自然在这三种主流风格之外,还有一些个体。如李明山的对近代中国编辑家的研究,李频对近代期刊史的研究,都有各自的特点。

面对六点不足之四点对策

中国出版史的各时段中,近代出版史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还是一个薄弱环节,^[1]尽管90年代后期以来有较大的改观。一个薄弱环节的改变是不容易的,这首先要找出不足。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几种关系的把握上,还有些不平衡——

1. 大与小。现有的近代出版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出版业,而又集中在个别出版机构,主要是商务,个人专著便有好几种,旧中国出版业有六大家之说,其他的几家,连对有中国出版老二之称的中华也没有像样的研究,遑论其他,开明、世界、大东、正中都缺少必要的研究。而中小出版业,虽然对于其中的左翼出版社如生活、读书、新知等有一

定的注意,但总体上说则没有太多的研究。

2. 官与民。中国近代出版业,民营出版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然要研究,而官方出版业作为它的对立面也是值得研究的,这样的矛盾运动才组成了一部完整的近代出版史。目前的研究对民营出版业注意较多,对于官办出版业则研究不够,早的如早期官书局,像金陵书局等,晚的如正中书局等,都没有研究。官办出版业是近代出版结构中的一个方面,而这都可以成为专门的课题,写成专题研究以至综合性的大书。

3. 内与外。这里所说的内既是指国内的研究,也是指内在的研究。内在方面的问题最基础的一项就是一手资料尚开掘不够,据说像商务和中华这样的大出版业还有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封存在铁箱中,有的还在露天。还有一个最基础的研究也存在薄弱环节,这就是对于出版物尤其是能够反映一个时代思想文化和学术走向的出版物研究不够(而近代以来这样的重要出版物是很多的),对于出版过程的研究也不够。而对重要出版物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外是指对于国外研究不太了解,国外对于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有一定的成就,韩国青年学者鲁贞银还来到中国对胡风的编辑思想进行学术的调查研究,尽管这种研究的着眼点是文学(《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期)。翻译过来的只有新西兰叶宋曼瑛的张元济研究著作,法国戴仁的商务研究著作,而据叶氏著作所附书目索引,国外对于商务的研究专著还有若干种。而国外综合性的近代史学术著作的出版专节(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研究著作),也还很少有人去发掘利用。

4. 微与宏。偏重个体的研究,对于编辑家、出版家个体的研究稍多,主要集中在张元济、邹韬奋、叶圣陶、茅盾、巴金、郑振铎以及胡愈之等,关于张元济研究还形成了不大不小的研究热,有好几种研究著作问世,对于人物的集束式研究则有丁景唐编著的《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对“五四”以来的31位编辑家作了研究(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王建辉的《老出版人肖像——从王韬到陈翰伯》,对52位近代编辑出版家作了整体的观照(1998年起《出版广角》以“百年先

行”的专栏开始连载,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而对于“现象”研究少,对于规律的探讨更少,很少有人去勾画从传统出版到近代出版以及从近代出版向当代出版演变的轨迹,也看不到近代中西出版业的比较研究。有《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著)之类的著作,但还没有《中国近代出版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宏观的研究比微观更为重要。

5. 老与少。在学院派中,老辈学人专门研究近代出版史的寥寥,只有少数的几位从别的学术领域兼及出版史,如刘国钧从书史的角度,来新夏从目录文献学角度(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200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出版业中,有许多老一辈从工作中退下后,热心于出版史的研究,但少一辈研究近代出版史的不多。这样便在力量的配备上不合理,形成不了整体梯队,形成不了学术对话。

6. 偶与常。所谓偶是说纪念性研究多,会议性研究多,所谓常是说常规性研究少,自为性研究少,虽然在90年代这种现象有所改观。如吴道弘先生说:“出版史研究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不同专题,对不同的观点需要交流与讨论。”^[2]近代出版史研究的交流与讨论是很不够的,需要常规研究的深入开展才能进行。只有偶与常的结合尤其是常的奋进,才能使近代出版史研究进入自由王国。

当然还可以列举一些不足。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是艰难的,成就与缺陷并存,辉煌与艰难共生。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还远未形成气候,没有形成规模,研究是散在的,在目前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至少时至今日还没有产生推动整个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明显上一个新台阶的力作与巨著。

“在当前应该提倡和重视20世纪出版史即近百年出版史的研究”^[3],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如果要深入研究,则仍然要从基础性的工作抓起。1. 重视基本史料的建设。在现有的几套史料集基础上,希望有学人能將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旧书报刊上的出版资料,做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理,编成一部规模相当的史料集,它将以当时人的当时记录和当时研究为重点、为主,和现有的几套史料集可以相互佐证为用。还可以编一套史料丛书,将一些重要的史料性著作以及各出版

业自编的旧资料汇为丛书重新出版。2. 广泛开拓题材视野,丰富近代出版史研究的内容。不论是过程,还是结果,不论是出版社、出版物,还是出版人,都要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3. 抓好出版科研规划。做规划一要薄古厚今,我赞成刘果同志在南京的编辑出版史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在出版史研究中要加强近代史部分的研究。二要改变目前这种完全散在的人各自为战的研究状态,加强学术合作以及与国外同行的交流。4. 出版史研究要转化为生产力。一方面是研究者对于出版改革和发展建设的关注与参与,一方面是研究成果要发掘近代出版资源和经验教训为当代出版服务。这是出版史研究能够取得巨大发展的一个关键。

近代中国出版史曾经导源出我们中国今天的出版,今天的我们理应对它给予更多的历史关注。

主要参考文献:

汪家熔:《编辑史、出版史讲座会上的发言提纲》(1999年,未刊稿)。

方厚枢:《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刊题录》(2000年,未刊稿)。

肖东发、袁逸:《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邓咏秋编:《20世纪图书出版业研究论文索引》,见王余光等《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

张志强:《20世纪上半叶的出版研究》,《编辑学刊》2001年第3期。

注释:

[1]宋原放:《提倡实事求是、扎扎实实的学风》,《出版科学》1994年第1期;肖东发主编:《中国编辑出版史》第2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2]吴道弘:《关于出版史研究论文述要》,《出版科研论文选粹》,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

[3]吴道弘:《摭说出版史研究》,《编辑之友》1999年第3期。

[本文为第10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汉城)论文,收入会议文集,并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10月24日]

目 录

对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代自序)	(1)
-----------------------------	-------

出版与近代文明	(1)
---------------	-------

思想文化史上的近代出版	(21)
-------------------	------

中国近代早期出版观探论	(36)
-------------------	------

中国出版的近代化	(52)
----------------	------

近代出版与近代教育	(64)
-----------------	------

近代出版的群体研究	(85)
-----------------	------

知识分子群体与近代报刊	(97)
-------------------	------

申报馆:报业之外的图书出版	(115)
---------------------	-------

上海何以成为近代中国出版的中心	(123)
-----------------------	-------

“五四”和新出版	(130)
----------------	-------

1935~1936 年:中国近代出版的高峰年代	(145)
-------------------------------	-------

大武汉:1937~1938 年的全国出版中心	(159)
------------------------------	-------

鸳鸯蝴蝶派与中国近代出版	(172)
--------------------	-------

现代出版史的一根主线	(184)
------------------	-------

书业竞争:考察近代出版史的一条辅线	(194)
-------------------------	-------

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良好开端	
--------------	--

——1950 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	(205)
-------------------------	-------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当代中国出版	(211)
----------------------	-------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

——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	(221)
旧时代商务印书馆与政府关系之考察(1897~1949)	(231)
旧时商务印书馆内部关系分析	(250)
商务印书馆编辑人的知识结构	(264)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薪水和作者稿酬问题	(274)
读商务史短札	(289)
商务与中华:中国近代出版的冠军与亚军	(297)
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出版	(305)
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之梁启超	(316)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出版	(327)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	
——博士论文开题报告	(345)
沈雁冰、叶绍钧与巴金编辑生涯比较论	(358)
出版是创造的文化活动	(373)
现代出版敬业精神论	(380)
出版决策人	(387)
编辑这个文化角色	(396)
编辑角色的多重内涵	(405)
编辑应是读书人	(414)
名家与编辑	(422)
总编辑点滴	(428)
名家做编辑四法	(434)
研究编辑出版工作的失误	(436)
书的旧事与启示	(438)
出版史的启示	(444)
后 记	(447)

出版与近代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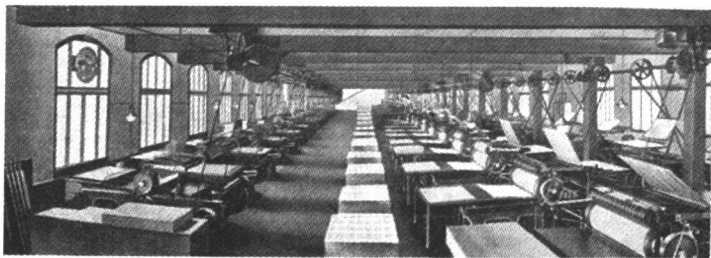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的出版业是从 19 世纪中叶起步的。19 世纪以来,中国遭遇从来没有过的大变局,给中国社会以从来没有过的大影响,近代出版业也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大发展。近代出版业是资本主义的出版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出版业展开,是近代出版发展的重要标志。到 20 世纪初年,出版业已初具规模,在对于近代文明包括社会 and 人的影响诸合力中,开始成为开智启蒙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广义的出版业包括报业、刊业和书业,本文以后者为主要的考察对象。

出版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门类

出版的繁荣不仅是一种文化的蔚兴,首先是经济的一种发展。考察近代出版经济的发展,可看如下三个标志性的方面:

其一,近代印刷业脱胎而出。

近代出版兴起后,带来印刷业的变革,也可以说近代出版业是近代印刷术变革的结果,这是相辅相成的。19 世纪中叶,王韬在由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里看到的我国印刷技术情形,是“以活字版机器印书”,“车床以牛曳之”,“竟谓创见”。^[1]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印刷生产力。近代印刷技术的进一步革新是随着近代国内商办工厂和民营企业的开办而出现的。西方印刷技术和中国汉字的结合,结束了沿用千年的旧的雕版技术和简单的手工扑刷操作,实现了印刷技术的根本性改



商务印书馆的铅印车间

造,出现了新的印刷技术如石印、新式转筒机等,在这样一种改造过程中,“凸版印刷术输入最早,平版印刷术次之,最迟者为凹版印刷术”。^[2]这样一个改造过程,是通过聘请外国技师、出国考察以及直接引进机器设备等几种方式实现的,它大大改进了印刷生产力。^[3]商务印书馆几乎每年都有印刷技术改进的措施。商务的创业人回忆商务印书馆:“自与日人合股后,于印刷技术方面确实得到不少的帮助。铜版雕刻、黄杨木雕刻、五色彩印,日本都有技师派来传授。”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叶圣陶,曾经有过下面一段表达自己对近代机器文明的切身感受并具有写实风格的描述文字:“高大且阴沉的厂房在路的两旁,喧响而单调的机器声振荡得人心烦乱,机器油的气味散布于空间,充满着劳工生活的感觉。我向前进行,环顾围绕我身的境界,只觉得我的……也许是人类的微小和无能。这是那个书局的印刷部。我从窗外望进去,每一架机器都在那里运动。屈伸的杠杆仿佛我们的臂膀,但是运动的迟速却绝对的均匀,没有倦怠的意思。”^[4]这样的描写,不仅仅说明机器文明进入了文学作品,也说明机器文明影响着人包括编辑人的视野。

机器印刷业前景广阔。西文印刷技术的推广,扩大了对输入“洋纸”以及制造“洋纸”的技术需求。“洋纸”的输入在1902年为260余万两,到1911年,9年间增长1倍以上,为560余万两。^[5]20年代杂志风行,进口纸张也因之猛增,从1918年到1921年,纸张的进口数几乎翻了一番。^[6]30年代,洋纸每年进口几千万元,国产新式纸张也有三五百万元。^[7]出版业中人充分认识到印刷业对于我国文明的重要性。